

Polemic, Reality and Chinese Malay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Jin Zhimang and His Practice of “Here and Now”

Show Ying Xin

**論戰、現實與馬華革命文學：
金枝芒的「此時此地」實踐**

蘇穎欣

蘇穎欣，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暨語言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兼講師。
聯絡方式：iishi.show@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年04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02月09日。

摘要

1947-1948年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經常被視為本土意識確立的濫觴，在不同歷史時空一再被召喚。它揭示並定調了往後馬華文學的兩道大命題：(一) 本土意識與中國性之間的關係，即馬華文學歸屬與認同的問題；(二) 現實主義(相對於現代主義)之於馬華文學書寫的意義，即文藝美學與政治倫理的問題。由於馬華文學論者一般將上述命題以相當二元對立的詮釋框架理解，本文認為重新梳理論戰中「馬華派」主將周容(金枝芒)的文學實踐，有助於我們克服冷戰形塑的對立框架，並試圖理解「馬華革命文學」形成的脈絡和其意義。金枝芒是馬共黨員，在緊急狀態時期加入武裝鬥爭成了軍中作家；其文學除了是革命證言，更是「文學作為革命」的實踐寫作。然而，他一方面忠於作為革命的文學寫作，一方面卻又試圖超越革命敘事本身的封閉性，呈現反差的張力。通過分析金枝芒的中篇小說《督央央和他的部落》(1954)和長篇小說《飢餓》(1960)，本文指出馬華革命文學的內在反叛與執拗說明了其功能不僅是反映客觀現實和此時此地的一種文學模式，也呈現對當下現實的認知和干預，甚至是文學對未來的預示和介入。

關鍵詞：馬華革命文學、金枝芒、現實主義、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冷戰、馬共

Abstract

The 1947-1948 literary polemic on the “uniqueness of Mahua (Chinese Malayan) literature” is often seen as a watersh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onsciousness among Mahua writers, and the contents are repeatedly called upon by critic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The debates have since set the tone for two major propositions in Mahua literature: firs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ism and Chineseness, namely the problems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s of Mahua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secondly,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realism (as opposed to modernism), which concerns the role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literature. Critics often regard the above issues in rather binary frameworks, an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revisiting the literary practice of Jin Zhimang, the key proponent of the “Mahua” camp during the debate, would help overcome the binary caused by the Cold War. The article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ual formation and meaning of Mahua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s a partisan writer from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Jin Zhimang’s works are not only a testimony to revolution but also a practice of “literature as revolution”. Nevertheless, while he was loyal to the writing techniques required by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he also made efforts to transcend the boundaries and functions of revolutionary narrative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inherent rebellious and pertinacious nature of Jin’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 novella *Tok Yang Yang and His tribe* (1954) and novel *Hunger* (1960). It argues that the function of Mahua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s not merely about reflecting objectively the “here and now”, but goes further to recognize that as refiguring the “future”.

Keywords: Mahua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Jin Zhimang, Realism, Uniqueness of Chinese Malayan literature, Cold War,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一、文學主體論

作為移民文學，馬華文學自20世紀初期以來，除了跟隨中國文藝及理論的發展，也不斷有建構本土性或在地性的話語出現。從1920年代「南洋色彩」的提倡，1930年代的「地方文藝」，再到戰後1947-1948年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可視為南來作家建立中國文學境外擁有主體性的文學的嘗試。馬來亞在1957年脫離英國殖民獨立（馬來西亞於1963年成立，新加坡於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但文學主體意識的建構並不因國土邊界確立和民族國家建立而完結。主體性的追尋至今仍是馬華文學的重要課題，例如1990年代掀起的「斷奶論」、「與中國說再見」、「經典缺席」、「現實主義理論破產」等論爭，以及近年由美國學界主導、學者應用在馬華文學研究的「華語語系」（Sinophone）理論，都可視為論者對馬華文學的邊界想像和文學形式及內容的規範，以促成馬華文學主體的建立。

上個世紀的亞洲文學，因西方思想的引入、帝國主義的入侵等因素，處在傳統失衡與現代轉型的交界點。一方面思考如何藉由外來思想革新文學，另一方面反省和維護逐漸被侵蝕的民族傳統，尋求主體的建立。中國文學從五四運動到延安文藝，呈現了革命中國的歷史經驗。韓國的民族文學論、日本的國民文學論、臺灣的鄉土文學論，也皆是時代的產物。類似「民族」、「本土」、「鄉土」、「地方」等詞彙，反映各文學系統自身的問題取向。而馬華文學1947-1948年的文藝論爭，則圍繞著馬華文藝的「獨特性」為論爭點。這場論爭經常被視為馬華文學脫胎於中國「母國」，確立本土意識的濫觴，也成為往後馬華文學的文化資源，「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一再被援引／召喚，以回應日益嚴峻的客觀挑戰。」（莊華興2005: 31）。

論爭內容不少仍是合乎時宜的爭論，包括「此時此地」中的「現實」意涵為何、馬華文藝沒有「偉大作品」的問題（經典缺席）、現實主義的困境、馬華作家應擔任翻譯和引介的角色等。這場論爭之所以一再被召喚，乃因其揭示並定調了往後馬華文學的兩道大命題——（一）現實主

義與現代主義之於馬華文學書寫的意義，尤其是文藝美學與政治倫理的問題；（二）在地／本土意識與中國性／中華性之間的關係，後來也延伸出「離散」流寓境況的討論，也就是馬華文學歸屬與認同的問題。多年來，馬華文學史家和評論者在這兩道命題上多有交鋒，而1947-1948年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則是起始點。

針對論戰起因和始末、其意義和影響等，已有相當多的討論。¹文學史家方修（1987）、楊松年（2001）、黃孟文與徐迺翔（2002）基本上皆認為這場論爭有重大意義，確立了馬華文學的自主性，終於脫胎於中國文藝並且從僑民意識轉向本土。莊華興（2005）對論戰多有著述，他最早牽引出論戰的外延政治因素，即論戰兩方分別代表馬來亞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的抗爭策略分歧。他也認為，相對於1920和1930年代的文藝口號，這場論戰更具前瞻性，除了宣告馬華文學自主性和主體的在場，也徹底釐清馬華文學書寫視域的問題，為之後的馬華文學奠定了發展基調（莊華興2005, 2013, 2018）。莊華興也特別重視論戰一方代表金枝芒，視他為馬華現實主義的標桿人物，可補充「經典缺席」的遺憾。謝詩堅（2009）則指出這場論戰的「中國因素」，即這場論戰脫離不了中國革命文學的框架。黃錦樹（2018）近年重新探討這場論戰，不過視角並沒超越他從90年代以來對「本土論」的批判，即本土論者對文學的要求是政治的、排他的，是非文學的。魏月萍（2019）則指出一個核心問題：這場論戰是否文學史意義大於其文學意義？文中她嘗試把論戰中不斷被複述的「此時此地」現實論，轉化為當代馬華文學作品中更多元的詮釋。

回到這場文學論戰發生的脈絡，其本質是政治的還是文學的，並不能分開來看。通過分析金枝芒從論戰時期到從軍時期的文學作品與實踐，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從論戰延伸出的「馬華文藝獨特性」內容，以及強調書

1 論戰過程可參考方修（1987）在《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的詳盡介紹和分析，有關論戰的篇幅占該書的三分之一。他歸納論戰發起的原因有三：（一）本地獨立運動熱潮的高漲，導致社會對作家反映現實的要求更迫切；（二）當時中國的民主運動也要求馬華社群的參與，要如何解決兩者間的矛盾為馬華文藝界要解決的任務；（三）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南來馬來亞的作家不時有「大漢沙文主義」作風，更大量描寫中國題材，導致馬華文藝工作方向不明。

寫「此時此地」的現實主義文學之於馬華文學及文學史的意義。本文擬重訪這場論戰和金枝芒的作品，從幾個問題意識出發：（一）如何跳脫已定型的「現代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政治」和「本土／中國／離散」的詮釋框架，理解這場文學論戰和金枝芒之於馬華文學史的意義？本文試圖指出論戰中對馬華文學的從屬和方向的提出，須放到冷戰的反殖民革命語境來思考，但同時必須超越冷戰形塑的二元對立架構。就此而言，文藝的實踐意義是該論戰的主軸，但實踐的本質不僅是政治的，亦是文學的。（二）從左翼鬥爭話語產生的「馬華革命文學」，之於馬華文學史有何意義？尤其晚近金枝芒作品的「出土」和討論，展現出對當代馬華文學批評話語的「不滿」，本文試圖回答這樣的出土意味著什麼。（三）金枝芒的文學如何展現「文學作為革命」的實踐意義？而這種實踐又帶著怎樣的批判力量和自覺反省？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重新還原論戰的背景脈絡，接著分析這場針對文學主體性的論戰為何以「獨特性」為切入點，金枝芒（周容）等人嘗試構建的「馬華民族論」為何。第三部分則分析金枝芒從軍後創作的作品，指出「馬華革命文學」可視為戒嚴時期的文學表達普遍遭壓抑下的「自由」創作，其遵循現實主義教條的作品不僅是反映客觀現實和此時此地的一種文學模式，更是進一步想像和預示未來的自覺反省。

（一）論戰背景

上個世紀從中國南來的文人，對南洋的「匱乏」不時有所批評。1926年《叻報》副刊〈星光〉編者段南奎就直說南洋社會是「陳腐的、墮落的、靜止的、停滯的、臃腫的、麻木不仁的、半身不遂的病社會」，而思想界是「閉塞得不能再閉塞了。消極的、消閒的、樂天的、復古的、不健全的、提倡迷信的、迷戀骨骸的思想〔…〕。」（楊松年2001: 34）另一編者鄒子孟也說，南洋的文壇是「充滿著依樣畫葫蘆的新八股文」，因此新創立的〈星光〉要「把南洋的社會，重新估定。今後本刊的態度，是驅逐黑暗，創造光明」（ibid.: 35）。可見這些南來文人不乏有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野心。從當時的副刊起名，也看出這群知識分子對南洋的想像：

枯島、荒島、浩澤、荒原、洪荒、沙漠田、墾荒……（*ibid.*: 35）。

1927年《新國民日報》的〈荒島〉開始，就提出要「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藝裡去」，編者之一張金燕就誇張地說自己「飲椰漿多過大禹治下的水了」，鼓勵作者書寫南洋風景和人事物（*ibid.*: 40）。爾後，建設南洋文藝的呼聲不絕於耳，1929年《南洋商報》副刊〈文藝周刊〉編者曾聖提建議，建設南洋文藝應往兩方面走：一是採訪馬來人的文化；二是描寫南洋華人及其他人種的生活（*ibid.*: 42）。《叻報》副刊〈椰林〉編者陳煉青則不僅提倡南洋色彩文藝，也進一步嘗試建立「南洋的文藝批評」。他直言，要以南洋為中心，「站在南洋的地位以立論」，中國的事物未必適合處在特殊環境的南洋，因此要另闢新途徑，建樹「南洋文學」（*ibid.*: 44）。

此後在1930年代的「地方文藝論」，則進一步推展這個命題，要求作家不要再「搬屍」，從中國把理論搬到馬華文藝界。1936年作者一礮提出相當精闢的說法，認為馬華文學不能直稱為「馬來亞文學」，而是「馬來亞華僑文學」，以和英文、馬來文等文學區分，也表示要放棄「南洋文學」這一稱謂。然而，他堅持馬來亞華僑的文學是沒前途的，尤其各民族間隔膜堅厚，華僑「夜郎自大」，對於馬來人、印度人往往看不上眼。他聲稱，華僑作者應該介紹各民族生活，讓人民知道「我們原是兄弟般地生活著」，不該再心向「祖國」（*ibid.*: 94）。另一作者保羅也強調馬華文學的「特殊性」，即馬來亞是殖民地性質經濟結構的社會，各民族與馬來亞的安全與和平共進退，因此「我們是需要大家有一共通的並進的生活與藝術」。因此他提出華人應該要用「新文字」寫作——拉丁化的文字，才能進入「馬來亞文學」，溝通各民族（*ibid.*: 95）。漢字拉丁化的說法，自然和當時中國的新文字運動息息相關，但卻是以華族、馬來族和印度族在馬來亞共同生活為前提，以促進各族相互理解、共建馬來亞為目標。縱使本土性話語當中不乏從中國移植、甚至是照搬過來的理念和口號，我們看到一個具有現代國家雛形概念的文學漸漸顯見——跨族群、創造「新語言」、以「馬來亞」而非「南洋」來定義文藝的屬性。

然而，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馬來亞華人作家亦全力發展抗

日救亡的文藝書寫行動。文學史家楊松年（2001）將這時期（1937-1942年）定位為「僑民意識騰漲，本地意識受挫時期」；而方修（1965）則以馬華作家寫作情緒高漲、作品百花齊放為由，將此時期定位為「馬華新文學的繁盛期」。知名文人如郁達夫、胡愈之、沈茲九、王任叔（巴人）的南來，亦帶動了當時的抗戰文藝發展。此時，支援祖國抗日戰爭的大主題和目標是作家創作的核心。

戰後，本土性課題再度浮出檯面。1947年10月開始，在《南僑日報》和《星洲日報》的副刊有秋楓、凌佐、漂青等人就「馬華文藝獨特性」做文章。11月，星洲華人文藝協會舉辦座談會談論此課題，並在12月3日及10日於《南僑日報》發表整理自座談會的文章。不久，彼時任職於馬來亞共產黨控制的《民聲報》的周容，在《戰友報》（抗日軍退伍同志創刊）上刊登了措辭犀利的〈談馬華文藝〉，正式掀起論戰。這場論戰至1948年4月方告一段落。論戰參與者就「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課題展開激烈辯論，尤以倡導「此時此地」寫作內容的周容（金枝芒）和強調馬華文藝應參與中國革命的沙平（胡愈之）為代表。簡言之，第一派論爭者呼籲馬華作家關注新馬社會現實，積極書寫「此時此地」的馬來亞現實內容，認為馬華文藝形式可以「暫時是中國的」，但內容必須「永遠是馬來亞的」。而第二派被認為是「僑民作家」，強調以民族解放為前提，中國的反封建和反帝與馬來亞的反殖民鬥爭性質一致，因此馬華作家應該積極參與祖國的革命抗爭。歷時半年的論戰規模史無前例，直接參與者至少20人，都是文藝界知名人物，連遠在香港的郭沫若和夏衍也為文回應。

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在1947年年底展開，在1948年上半年結束，絕非偶然。這和戰後馬來亞的族群政治、國家憲制和公民權爭議息息相關。戰後百廢待興，英國人重返馬來亞後，在1946年宣布成立「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卻激起馬來人的激烈抗議，視之為剝奪馬來統治者（蘇丹）的權力，其公民權的「屬地主義」條例讓多數華裔和印裔移民自動成為公民，也被認為剝奪馬來人特殊地位，最後催生了馬來右翼政黨巫統（UMNO），掀起以「馬來人利益」為主要訴求的馬來民族主義運動。

一般華人贊成該計劃自由的公民權條例，不過由於內容不清楚，華人社群並未積極表達看法，華文報也未見反對聲音（Cheah 1978: 102-103）。但是，左翼與馬來亞共產黨卻反對馬來亞聯邦計劃，主要原因是新加坡被另劃為直屬殖民地，以及該計劃雖規定公民資格，卻沒賦予公民權利，將立法和行政大權集中在英國總督一身（崔貴強2007: 226）。

無論如何，馬來亞聯邦計劃因馬來人的強烈反對而告吹，英國殖民政府邀請馬來蘇丹與巫統秘密商議，制定新憲制建議書。最後他們提出「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而代之，恢復馬來人特殊地位和馬來統治者權力，並且有更嚴厲的公民權條文。1947年，跨族群的左翼聯盟「人民力量中心—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合陣線（PUTERA-AMCJA）以大型反對運動抵抗，提出更為進步的「人民憲章草案」，其中包括彈性的「馬來由公民權」（Melayu citizenship）定義，並以1947年10月的全馬總罷市（Hartal）為高潮。²反對聯合邦憲制運動中，馬共扮演主要的推動角色（Yeo 1973: 40）。不過，在冷戰的背景下，左翼聯盟很快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打壓，《馬來亞聯合邦條約》在1948年2月正式實施。同年6月，全馬進入緊急狀態長達12年（1948-1960），馬共被宣布為非法組織。曾參與抗爭運動的左翼人士若非被逮捕，就是流亡或「上山」進入森林，參與馬共的地下鬥爭。

（二）馬共鬥爭與馬華文藝

如前所述，1920、1930年代就已有書寫此時此地的論爭發生，而戰後文學論戰之所以規模如此甚大，華人的政治參與是重要導因。因此，爬梳當時的社會和政治脈絡，有助於理解促使論戰產生的複雜政治面向，而不僅將之視為文學內部的問題。論戰在總罷市的背景下展開，在緊急狀態正式頒布前結束。很快地，發表論戰文章的左翼報刊如《民聲報》、《戰友報》、《南僑日報》、《風下》周刊相繼被殖民政府查禁。金枝芒「上山」進入森林參與馬共武裝鬥爭，論戰另一方的胡愈之、汪金丁、李玄等

2 有關左翼聯盟與殖民—馬來菁英提出的不同建國藍圖，可參考阿都拉曼恩蓬（2017）。從戰後到這時期反對新憲制的評論，可參考朱齊英（2009）編《馬來亞民族運動史料選輯（上、下冊）》。

作家不是主動北歸就是被遣返中國。莊華興（2005: 27）和謝詩堅（2009: 130-141）皆指出，1947年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的肇因是左翼鬥爭策略的分歧，也是馬共與民盟（中國民主同盟）的交鋒——首先是對馬來亞政治立場的迥異，然後是對華僑雙重任務看法的分歧。馬共在緊急狀態前積極參與馬來亞政治，是反殖民運動的先鋒；而民盟以促進中國民主為鬥爭目標，不干涉馬來亞政治行動，因此不參加反對新憲制的總罷市（崔貴強 2007: 105）。原本相互合作的兩個左翼團體，在此出現鬥爭路線的分歧。主要導因除了馬來亞緊迫的政治局勢，激烈的國共內戰也加速了兩方對華僑任務主次看法的分歧。我們或可從馬共鬥爭策略的歷史轉變，來了解促成論戰「馬華派」的社會條件。

南洋共產黨（前身為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於1930年解散後，共產國際代表胡志明促成馬來亞共產黨於同年成立。初期，馬共黨員來自以華人為主的各階層人士，領導層有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Yong 1997: 167）。知識分子清一色是受中文教育，其他的學歷都不高，究竟他們主要是因愛國主義（民族）或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影響才加入馬共，甚難判斷。不過，較明顯的是馬共對受英文教育的華裔頗為排斥及猜忌，將他們視為效忠英國的反動階級（Cheah 1979: 58-59）。

由於下南洋的底層勞工多是為了淘金賺錢，期盼發跡後「成為資產階級」光榮返鄉，他們在南洋的工作亦受益於英國殖民者的橡膠與錫礦產業，因此共產黨的反帝反英訴求並不大受落（Belogurova 2019: 197）。馬共鬥爭的群眾目標也不斷轉化，一方面在民族利益層次上不排除與華人資產階級合作，使英殖民者擔心馬共反帝訴求能動員全體華人（1930年代的經濟蕭條亦衝擊華人資本家）；另一方面，馬共也一直強調深化階級鬥爭，視無產階級為「馬來亞革命」的最主要推動力，而非城市居民及民族資產階級（ibid.: 200-202）。可見，在「民族」和「階級」之間，以華人為主體的馬共經常面對拉扯。

創黨初期，共產國際支持馬共成為一個在地的多民族組織，指示馬共積極吸收馬來與印裔黨員，同時亦在國際主義理念下支持印度和中國的

革命，相信中國和印度的民族解放將有助於馬來亞的民族解放，反之亦然（*ibid.*: 61）。與此同時，馬共亦強調馬來亞的革命必須是建立多民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的統一陣線，爭取反帝獨立。馬共中央宣傳部在1934年就寫道：

馬來亞革命是世界革命運動的一瞥。我們有兩個選擇：繼續為資本主義做牛做馬，或是團結起農民、工人、學生、知識分子、無產階級，以及世界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一起打敗世界資本主義。達致馬來亞的獨立需要各民族的團結，我們必須動員馬來亞弱勢民族的被壓迫群眾，如馬來族、華族和印度族，共同爭取馬來亞獨立，組織一個由多民族群眾組成的反帝國主義陣線。（*ibid.*: 110；由本文作者翻譯）

顯然，早在1930年代，馬共就有通過跨族群陣線爭取馬來亞獨立的願景，雖然馬來亞遲至1957年才取得獨立。不過，此時的鬥爭理念是國際主義，未有清楚的「國家」意識。當時，大部分華僑仍以中國為祖國，國家認同的轉變到戰後才更為顯著。儘管馬共在1930年代就提出跨族群的反殖獨立鬥爭策略和口號，但大部分自中國南來的黨員仍以中國革命為目標，動員當地華人社團支持中國革命（*ibid.*: 110）。到了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馬共的抗日救國運動成功獲得馬來亞華人的支持。這時，共產國際批評馬共過於投入中國對日本的抗戰，而忽略在馬來亞更為切身具體的反英鬥爭（Hara 2016: 131）。

不過，在納粹德國於1941年入侵蘇聯以後，共產國際呼籲各國共產黨全面發動反法西斯抗爭，並有條件地與盟國合作，包括英國。這也促使馬共在二戰期間與英國合作，成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因此，日本投降後馬共與英國同屬戰勝盟友關係，在戰後未即刻採取反英抗爭，且因為馬共總書記萊特（Lai Teck）採取爭取憲制鬥爭的溫和路線，³使得英國人在1945年9月再次重新占領馬來亞。「三面間諜」萊特失蹤後，馬共自1947年起啓動武裝鬥爭路線，頻頻對英殖民政府發動進攻。1948年6月，英國殖民

3 萊特是越南人，自1938年成為馬共總書記。他實為三面間諜，戰前為英國人服務，戰時為日本人服務，出賣同志並捲走大筆黨款。而馬共遲至1946年底才發現其可疑之處，於1947年3月才揭發他。見後來取代萊特的總書記陳平（2004）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第11、12章。

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馬共成爲非法組織，轉入地下進行森林游擊戰。1955年與馬來亞政府代表的「華玲和談」失敗後，馬共繼續武裝革命，直至1989年「合艾和平協議」後才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1947-1948年論戰中強調「馬華文藝」、反對「僑民文藝」的主將周容，即是馬共重要文宣金枝芒，曾任《北馬導報》、《民聲報》、《戰友報》等報刊編輯，主編文藝副刊。緊急狀態後，金枝芒進入森林參與馬共武裝鬥爭，在1961年被黨委派到中國，後來負責籌劃湖南「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的華文組，1988年病逝於北京。戰前馬華作家亦有馬共黨員，例如在抗戰期間與郁達夫打筆戰的耶魯（黃望青）和被方修認爲是「戰後初期成就最高」的詩人鐵戈。概言之，馬華文學和馬華左翼運動，在20世紀上半葉幾乎是同列並行，互爲補充。而作爲政治組織的馬來亞共產黨，則是讓華僑參與在地政治鬥爭、建立在地認同的管道（親國民黨的馬華公會遲至1949年才成立）。馬共在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指導」的同時，亦將「民族」、「國際主義」、「階級」等話語的內容轉化爲適應在地政治鬥爭的實踐內容。

有關論戰當時華僑的「國家認同」，《南僑日報》在1947年3月至6月間一項涉及2萬逾人的民意調查中，發現高達95.6%的讀者表示願意「做馬來亞公民而不脫離中國籍」，僅有3.1%的讀者願意「脫離中國籍做馬來亞公民」（崔貴強2007: 185）。這意味著，大部分華人當時抱著取得「雙重國籍」的如意算盤。遲至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宣布中國不允許雙重國籍，南洋華人才選擇入籍或歸國。然而，在1947年的馬來亞，馬共的鬥爭卻不允許這樣「左右逢源」的認同歸屬。根據陳平所述，馬共在1946年已訂下了明確的國家認同。

〔…〕我們從此以後不以自己是海外華僑自居。相反地，我們應把自己當作是本地的馬來亞華人。我們是馬來亞的其中一個族群。我們效忠的國家是馬來亞，而不是中國。

〔…〕我們開始在黨訊和報章上撰寫這方面的文章，卻立刻受到老共產黨員的反抗。這些在抗日戰爭爆發後離開中國到馬來亞的中國共產黨員全都有抱怨。他們大力反對把他們的命運與馬來亞結合，斷絕與中國的聯繫。他們爲文強調他們是中國人，祖國的

利益至高無上，並應致力於協助中國。他們決定保持海外華僑的身份。（陳平2004: 146）

黨立場如何轉化為個人國家認同，相信並不如陳平所說那麼清楚明了。然而，陳平的這段文字也大致概括了論戰當時左翼內部「馬華派」與「僑民派」的差異，而金枝芒與胡愈之分別代表了這兩派。論戰兩派最大的分歧即是馬來亞華人的「雙重任務」主次問題——支援中國民主革命為先，還是馬來亞民主革命重要？推崇「人民憲章」和「全馬總罷市」的馬華派，主張馬華社群積極參與當下的馬來亞制憲鬥爭，拋棄僅僑居於此的觀念。而胡愈之等南來文人，雖然支持華僑參與當地民主鬥爭，卻強調中國革命的迫切性。這時，馬華文藝的書寫意識應該往哪個方向走，就成了兩派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內容的爭論點。

二、獨特性：「馬華民族」建構的困境

（一）未來式的民族雛形

論爭圍繞「獨特性」一詞展開，即馬華文藝有沒有獨特性的問題。金枝芒在〈談馬華文藝〉一文中，明確表明「一切文藝都是有獨特性的，沒有獨特性的文藝，是僑民文藝」（周容2018: 200）。這說明了，相對於馬華文學的獨特性，另一面是被移植的中國文藝普遍性。若在馬來亞書寫普遍的中國文藝，則只是中國文藝的外延，沒有獨特性。然而，馬華文藝的獨特內容是什麼？從金枝芒的論述來看，那其實仍未存在，而是未來式的。他認為，馬華文藝沒有中國秧歌或馬來民間藝術等可採用的傳統形式，必須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才能找出所謂的「獨特形式」。他更進一步指出，要尋求和建立的不只是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更包括馬來亞文藝的獨特性。

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必須肯定和發展，而馬來亞三大民族共同的獨特性更必須尋求和建立，但在目前，也許還只能是具體調查和理論研究的時期，向著這條目標努力，至於真正的獨特形式的馬華文藝以至馬來亞文藝，那恐怕要在工作過程中，要在創作實踐中發現、發展，然後加以確立呵！（ibid.: 202）

他當時也已考慮到馬華文藝對馬來和印度文藝的無知是個大問題，而馬來亞

文藝的獨特性或許還不存在，也不應該糊裡糊塗地定出三大民族共同的獨特形式，引導作家去創作發展。因此，馬華文藝和馬來亞文藝的獨特性和主體性，其實尚未實質地成立，而是要去發現和創造的未來形式。不過，他清楚知道這個未來的方向和前景，必定是要放下「僑民意識」才能達成。在馬來亞聯邦憲制報告出臺的1947年，「馬來亞」這個新國家的未來藍圖，顯然是提出替代憲制的左翼聯盟最關注的課題。就此，金枝芒批評馬華文藝竟然「遠遠落在現實形勢的後面」，脫離了此時此地的馬來亞現實。金枝芒的看法其實並非獨創。左翼戲劇家杜邊也在1947年「星洲華人文藝協會座談會」上說，馬華文藝的獨特性並非憑空去創造三大民族的共同形式，也不是找出三大民族各自的獨特性再把它們糅合起來成馬來亞形式，「那是一種幻想的做法」（秋楓2018: 196）。他認為，提出獨特性的問題不是因為宗派觀念作祟，而是「客觀現實已經存在了的問題，不應迴避也不可能迴避的問題」（ibid.）。換言之，現實形勢擺在眼前，已然到了作家必須選邊站的時候。因此，獨特性論戰的本質其實是一個立場和原則問題的論爭，是有關文藝如何服務現實政治鬥爭的論爭。金枝芒直言：

一切文藝有獨特性，這是因為只有有「獨特性」的文藝，才是現實主義的有藝術價值和政治價值的文藝；這是因為只有有「獨特性」的文藝，才有此時此地的戰鬥作用，才能發揮文藝武器的力量，才能有力的幫助現實的政治鬥爭。（周容2018: 201）

他的文章旋即引起李玄（楊嘉）和沙平（胡愈之）的回應。沙平（1948: 1）的〈朋友，你鑽進牛角尖裡去了！〉一文，對「文藝獨特性」一詞頗為不滿。他認為「離開了中國化，便不能想像馬華文藝的獨特性」。他說，很難指出某一國家和某一民族有某種獨特性，而只能說某個社會有某種獨特性。因此，作為殖民地社會的馬來亞，任何書寫反映殖民地封建性剝削制度與奴隸制度的文藝，都是反映馬來亞此時此地的現實的文藝。即使沒有來過馬來亞的魯迅，其《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也是反映馬來亞華僑社會的現實的作品；不一定要書寫1948年的馬來亞才算是有獨特性的此時此地的現實。他也聲稱，馬華作家在「文化水準低落的國家」，其角色是將中國作品翻譯成英文、馬來文、印度文，協助「中國文藝的海外版」的出版與發展。顯然，胡愈之指的是包含在中國文藝內部的馬華文藝，與

金枝芒和杜邊等人指的馬來亞文藝內部的馬華文藝，呈現出不同的民族與國家想像。

由於這場論爭規模甚大，其在馬華文學史上亦有重大意義，導致論者經常過於二元對立地詮釋這場論戰，將「馬華性」和「中國性」視為非此即彼、勢不兩立的概念。例如方修認為這場論戰是配合馬來亞獨立運動的文藝「自立運動」，站在國家／國籍的立場解釋這場論戰的必然性：

馬來亞要求獨立，馬來亞的華人要做獨立國的主人，馬華文藝自然沒有理由不獨立發展，沒有理由追隨中國文藝的路向。所謂獨特性，就是表示馬華文藝要和中國文藝分道揚鑣，服務於當地的獨立運動。（方修1987: 75-76；粗體為引者所加）

另一方面，也有論者質疑這場論戰的精神史意義被學界高估。吳小保（2019/12/06）指出，馬華左翼文學如果已在1940年代有了明顯的祖國（馬來亞）認同，不應在1960年代文革時期仍然對中國文學亦步亦趨、隨之起舞，對毛澤東盲目崇拜。他質疑，如果文藝獨特性論戰之後，馬華知識界已建立了主體身分，與中國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關係應該已得到釐清，不再困惑，為何還會出現文革潮文學的現象？謝詩堅（2009）認為中國革命論述從1920年代起一直持續影響馬華文學，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1976年為止，這樣的「父子」關係持續至少半世紀。如此說來，所謂已釐清和中國的關係或和中國文藝分道揚鑣，似乎是過於一廂情願的說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普遍上馬華學界認為1947-1948年獨特性論戰是馬華派占上風，但雙語知識分子、歷史學家王賡武卻認為當時是僑民派獲勝了。原因並非支持者不多，事實上本地出生的年輕作家皆大力支持馬華派，而是因為報紙和出版社皆由僑民派給占據了（Wang 1964: 251）。顯然，「在地認同」的討論並不能單面地看，更涉及生產機制和文化資本的問題，當然也關涉英殖民政府的戒嚴政策。誠然，若當時普遍上馬華作家的認同和書寫視域已經釐清，就不會有1990年代的「斷奶論」爭議了。

其時作家雖然沒有針對「馬華民族」一詞展開論爭，內容卻圍繞民族概念展開。莊華興（2010）曾從民族文學的角度，分析馬華文藝從中國的「大後方文藝」轉變為馬華（民族）文學的過程。這過程除了受中國國內

政治社會變動影響，也是馬華主體對殖民主義的回應。莊文是少數思考殖民現代性如何影響馬華文學建構的文章，他指出「西方－中國雙殖民主義」對馬華寫作意識和現代性產生具體影響。「雙殖民主義」概念的提出是重要的，不過莊文將中國民族主義在南洋的影響等同於「軟殖民」的說法，值得進一步商榷。對這批有強烈民族認同的南來文人來說，將中國視為殖民母國的說法似乎過於牽強。即便他們反對僑民文藝，在當時他們仍然普遍視中國為祖國。事實上，戰後馬來亞華人確實有相當特殊的「雙重殖民」感覺和經驗，但這並非受中國「軟殖民」，而是因為中國的半殖民地社會性質（依據左翼的說法）讓馬華作家也同樣體會中國人受壓迫之感，同時也因身處的馬來亞完全被英國殖民的狀況，造成華人在文化情感上對列強在中國領土上的侵略深感屈辱，而在馬來亞又切身面對英國殖民的剝削。這種雙重剝奪感促使獨特性論爭中的金枝芒嘗試建構一個民族視角的馬華文藝。

（二）雙殖民、雙民族、雙重任務

金枝芒在論戰第二篇文章〈也論「僑民文藝」〉中，大篇幅批判「僑民作家」，也進一步釐清馬華作家的雙重任務。簡言之，他其實同意馬華作家有雙重任務，而且華僑愛國（中國）亦可是馬華作家的創作動力，但唯有表現馬華現實的作品才能服務於愛國運動，而非書寫中國的作品。

可能有些朋友們，猜測著我是反對華僑應該愛國的，那是一個不幸的誤會。我主張馬華文藝應該表現此時此地的馬華現實，目的只是為了促使馬華文藝能夠有力的服務於馬華的政治鬥爭。這裡所指的政治鬥爭，一方面是各民族聯合的自治運動，另一方面也就是馬華的愛國運動。這二種運動雖然有明朗的區別，但是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也是民族民主革命。有需要再說一句，我認為能夠最有力服務於馬華愛國運動的文藝，應該是表現此時此地現實的馬華文藝，而不是「手執報紙而眼望天外」所虛構出來的「僑民文藝」。（周容1948: 224-225；粗體為引者所加）

金枝芒文章的這部分是論者經常刻意忽略的。這裡的「愛國運動」指的是馬華社群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雖然馬來亞各民族聯合的反殖民自治運動是主要鬥爭，但兩者息息相關，缺一不可。顯然，幾乎無意識地將中國視為祖國，卻同時耕耘馬來亞的獨立運動，是這期間左

翼華人的普遍狀況。另一篇1948年由《民聲報》刊出的〈馬華文藝論爭的諸問題——一個座談會的結論〉中，記錄者文萱⁴也強調，馬華愛國運動的內容一個是「在精神上和人力物力上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另一個是打擊馬華內部的反民族反民主的黨棍分子」（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2018: 235）。因此，若從當代角度將這場論戰視為「去中國」的論爭並不甚準確，其時作家的認同和寫作態度仍有不少游移的空間。不過，金枝芒等人未嘗不是在勾勒一個民族的雛形。例如，一方指「所謂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實際上應該就是民族化」（ibid.: 237）；另一方則指「我們不反對馬華民族的形成，但，我們應該通過國際主義觀點看一個民族」（秋楓2018: 251）。在亞洲，有關民族或民族文學的討論離不開反殖民的獨立自主運動，也可說是危機意識下的產物。然而，在這場論戰中針對民族的討論並不僅為了抵抗殖民外敵，也因為此時「民族」一詞所指涉的共同體成員、內容和邊界想像仍然未明，故必須進一步釐清。在當時，馬華作家能夠參照的經驗除了中國以外並不多，馬華左翼文人亦以中國左翼思想為思想基礎。不過，論戰期間的馬華派試圖開創具有「馬華民族性」的文藝內容，他們認可的具有「馬華獨特性」的創作有林參天的《濃煙》、馬寧的《椰風蕉雨》、鐵戈的《在旗下》和丁家瑞的《怒吼吧，新加坡》等作品，認為這些才是反應此時此地馬華現實的作品。

誠然，「馬華民族」的建構是個複雜課題，它如何和「馬來亞民族」並置討論，並未在此論戰中展開。金枝芒的雙民族視角並非以國家認同和國籍身分作為基礎，而是以具體在地實踐為依據。⁵對當時的馬華作家而言，「此時此地」和現實主義不只是抽象的文學概念，而是移民社群得以實際參與在地政治的唯一途徑。論戰中，金枝芒的馬華民族論和馬華文藝獨特性是相對於「僑民文藝」而言，而他並未對馬華文藝和馬來亞文藝之間的內容關聯作出具體闡述。若非緊急狀態在1948年頒布，導致左翼遭對

4 根據馬共黨員的編註，此人就是周容。

5 這與1990年代馬華文化界瀟灑的「雙重邊緣」憂患意識——身處中華文化和馬來西亞文化的邊陲地位——大不相同；反之，金枝芒強調運用既有資源積極介入現實。

付，有關民族的討論或許得以進一步展開。在現代國家概念普遍化的今日，「馬華民族」已被認為是迂腐陳舊且政治不正確的詞彙。民族的提出非但不是革命的、進步的，而是保守的，排外的。這個狀況在馬來西亞特別明顯，尤其表現為民族主義的內涵縮小到族群民族主義。戰後馬來西亞在經歷馬來人對馬來亞聯邦的反彈後，「馬來民族主義」（*kebangsaan Melayu*）原先的進步性和反殖民個性，也被限縮至一個排外的主權民族／族群／國家。馬來亞聯合邦的英文國名為 *Federation of Malaya*，然而英國殖民者為了安撫馬來民族的不安，將馬來文國名定為富有族群意涵的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馬來土地聯合邦），而非 *Persekutuan Malaya*（馬來亞聯合邦）。可見，當時馬來人對民族（*bangsa*）與華人對民族（或三大民族共組的馬來亞國族）的想像並不一樣，甚至是相互衝突的——*bangsa*未必包含華人，而馬華民族的提出則違背國家團結。就此，西方概念下成立的新國家，其 *nation*（國家）或 *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意涵也未能完全調解「*bangsa*」和「民族」在馬來亞現實的內在衝突，遑論建立一個共同的政治共同體想像。⁶這是一個至今仍纏繞馬來西亞各族群的困難問題。

左翼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是金枝芒的思想基礎，他強調「民族」是立基於人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也就是當下馬華社會面對的物質和現實問題，而不只是文化和國家認同的問題。金枝芒雖然同意馬來亞與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性質一致，但強調不同地域的現實內容並不一致，而身為文藝作家必須通過具體形象和人物描寫刻畫現實，不能通過一般的抽象概念陳述現實，否則馬華文藝就會「被取消」了。就此，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必須建立起來，才能完成馬華民族的雙重任務。簡言之，金枝芒強調生活和寫作的實踐性是一體的，思想和經驗不能斷裂。這時，「民族」問題就不是一個血緣和文化傳統的問題，而是一個物質的、階級的實踐問題。

6 有關 *bangsa* 和民族兩種概念在馬來亞的修辭演變，可參考陳綠漪（*Tan Liok Ee* 1988）。戰後馬來民族對新國家、民主和社群的概念可參考阿里芬奧瑪（*Ariffin Omar* 1993）；有關戰前馬來民族主義的起源可參考洛夫（*William Roff* 1967）。

在這個層次上，馬華文藝運動是和「愛國運動」一起進行的，並且也和「馬來亞文藝」運動一起進行。因此，馬華（民族）文學的建設不是個國籍選擇的問題而已，更是在「雙殖民」經驗下發展出「雙民族」視角的革命追求。在此，不難發現金枝芒的基本文藝觀來自毛澤東。在〈也論「僑民文藝」〉一文中，他就引述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大後方到延安的作家應該寫「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來批評南來作家不深入此時此地的馬華現實，還盡寫一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周容2018: 225-226）。他對文藝思想落後於現實的批評，還有對民族矛盾主次順序的判斷，很大可能也來自毛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不過，本文不意在證明金枝芒多受毛澤東影響（畢竟當時大部分左翼華人皆是），而是要指出金枝芒對「馬華／民族文藝」主體性的構想，並非簡單的「和中國文藝分道揚鑣」，因他恰恰是吸收了中國的文藝和革命理論，將之轉化為符合馬來亞社會現實的文藝理論。然而，獨特性論戰是針對文藝內容的書寫方向之爭，並沒對文藝形式和技巧有過多著墨，也沒激起新一波文藝形式的寫作熱。因此，社會現實主義創作依然主導馬華文學，一直到1960年代以後。

雖然吸收中國文藝理論，但金枝芒落筆犀利，諷刺那些抗戰時期來馬來亞「等待中國人民大翻身」的作家，甚至連僑民作家都不是，而是「逃難作家」。他更進一步批評不願意「突入現實」（*ibid.*: 203）生活的作家，是因為他們的「大國民思想」作祟。對於抱有「牢不可破的大國民思想」、認為馬華「沒有偉大作品」的僑民作家，金枝芒嚴厲斥責他們是「手執報紙而眼望天外」的「非現實主義」作家。他批評胡愈之把馬華文藝運動當成「中國作家寫，馬華青年讀」，忽視馬華文藝從萌芽到成熟，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因此，他寧可「愛馬華文藝的幼稚」，也不「愛僑民文藝的空洞」（*ibid.*: 230）。他呼籲馬華作家應該為馬華讀者寫作，參與在當下馬來亞面臨的現實狀況裡面，而非置身事外。在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左翼鬥爭中，仍然有「大國」和「小國」之間的實力不均衡問題。作為在中國出生爾後南來的作家，金枝芒在1948年提出中國人的「大國民思想」問題，可謂相當有所自省，且體現弱小民族互助的精神意識。在此，

馬華民族／文藝選擇站在同樣「幼稚」的馬來亞民族／文藝的立場，不願做「大國民」。另一方面，1950至1960年代馬來亞獨立前後，華人社會響應建國號召學習「國語」（馬來語），不少左翼人士更排斥學習「帝國語言」英語，相信其理念和理想已在1947-1948年的獨特性論戰形成了基礎。⁷

抗戰時期名作家如郁達夫和胡愈之的南來，雖然在馬華文藝界鼓舞了不少作者，可兩人都陷入與在地作家的筆戰。這除了揭示南來文人的階級問題之外（郁達夫、胡愈之的知識分子身分，相對於農民出身，在礦場工作過的金枝芒），也還涉及馬華文藝沒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的問題。事實上，如巴人、楊騷、郁達夫和胡愈之這些知名作家來到南洋，也沒能創作出一部傳世的「偉大作品」。他們在南洋的角色更是社會活動家，救亡活動的成就反比文藝創作來得高，留下的也並非文藝作品（林萬菁1994: 185）。

無論如何，金枝芒在論戰中展現的時代性文藝觀，至少在三個層次上對戰後馬華文藝做了一次意義重大的方向指引：雙殖民結構下「馬華民族」主體雛形的建構、文藝實踐論的深化，以及大國民思想批判。或許可以說，相較於1920、1930年代南洋色彩或地方文藝的提倡，1947-1948年的文藝獨特性論戰將馬華文學和華人的政治命運緊緊聯繫起來。「僑民派」延續戰前的本土意識，強調包括在中國文藝以內的馬華文藝「地方性」，「馬華派」則轉向與在地政治改革密切結合的現實主義文藝。不過，其時「馬華派」引用的文藝理論，主要仍然來自中國，甚至是延安。要將之運用在本土並轉化為在地革命語言，其時僅能依靠對建國的未來想像。論戰在緊急狀態頒布前夕結束，文壇在長達12年的戒嚴體制下，左翼馬華文學內部的批判力受到打壓而呈現扭曲狀態，加上1950年代以來現代主義思潮的發展和接受，金枝芒的文藝觀是否和如何獲得接受繼承，是個大疑問。不過，他從軍後在森林出版的作品，在隱匿多年後方在2000年以後出版，就能讓我們挖掘因緊急狀態而被中斷的「馬華民族」討論，如何通過「革

7 關於華社在建國時期積極學習馬來語的過程，可參考華馬翻譯家楊貴誼（2006）的回憶錄。相關著述可參考吳小保（2016）。

命文學」的實踐繼續在森林中展開。

三、「出土」的金枝芒：現實主義重探

近年來，金枝芒的「出土」可謂馬華文學的一樁「事件」。其小說的出版除了獲得馬華文學評論者的關注，也引起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注意，頗有「經典化」之意味。⁸莊華興（2018: 28）認為，金枝芒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飢餓》，便是「經典缺席」生產性空洞被填補的具體象徵，一個新文學意識的起點。換言之，《飢餓》這部作品的「出土」和重新發現，讓關注馬華文學經典缺席的論者，不得不重新審視現實主義作品之於馬華文學的意涵。

周容原名陳樹英，1912年出生於江蘇常熟，曾在中國參與抗日活動被逮捕。1937年與妻子南來，至霹靂州督亞冷同漢華文小學任教，後在礦場、鐵廠、芭場工作過。他以金枝芒、殷枝陽、乳嬰、周容等筆名在報章上發表抗戰文學作品，隨後任職於《北馬導報》和《怡保日報》。方修（1970: 12）在《馬華新文學大系》中說：「乳嬰雖然寫了不少中國題材的小說，如〈逃難途中〉、〈小根是怎樣死的〉等，但他主要的貢獻是在一系列反映抗戰初期馬華救亡運動的健旺狀態的創作，包括〈新衣服〉與〈八九百個〉。」除此之外，金枝芒還有〈弗琅工〉、〈犧牲者的治療〉等描寫抗日的名篇，皆獲得不俗的評價。戰後，他被調到吉隆坡《戰友報》和《民聲報》工作，也在《風下》周刊發表一些蘇聯文學的翻譯作品。

1948年緊急狀態以後，金枝芒便銷聲匿跡，一些人以為他與其他左翼人士一樣被遣返中國，其實他已進入森林參與馬共武裝革命，更在部隊裡以「周力」和「老陸」等名字繼續提起筆桿子創作。金枝芒在1953年參與

8 哈佛大學王德威主編（Wang D.W. David 2017）的巨作《現代中國新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於2017年出版，其中一章節就包括金枝芒的《飢餓》。2016年出版的《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文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中，沈雙（Shen Shuang 2016）的文章就比較金枝芒和亞裔美國作家黎錦揚（C.Y. Lee）的作品。

馬共中央部隊從彭亨向馬泰邊區轉移的「長征」。1958年，他主持戰鬥故事叢書《十年》的編寫和出版，向部隊成員徵集戰鬥故事，紀念抗英十年（1948-1958），在部隊裡油印傳閱以鼓舞鬥志。1960年，他的長篇小說《飢餓》（上、下冊）由吉檳州北星社油印出版，隨後金枝芒於1961年被組織派往中國，自此沒再踏上馬來（西）亞的土地。⁹1969年，他負責籌組的「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在湖南開播，金枝芒是電臺華文組第一把手，也編了一本《華語馬來語對譯簡明詞典》。電臺在1981年停播後，金枝芒前往北京，任馬共中央海外代表團秘書，後於1988年病逝北京。然而，1948年以後，金枝芒的創作與行動只有馬共內部知曉，外部不得而知。一直到1989年馬共走出森林，馬共黨員方才知曉他們熟悉的「周伯伯」原來是著名戰前馬華作家金枝芒（方山2004）。2004年起，前馬共成員籌組的21世紀出版社陸續出版金枝芒作品，封他為「人民文學家」。¹⁰該出版社在2000年以後陸續出版馬共領導層回憶錄、黨文件集和中央立場的歷史故事，不無在後冷戰時代爭取認同之意。¹¹下文將討論金枝芒從軍後的幾部文學作品，探討他如何通過書寫革命的身體，以實踐其在論戰中強調的現實主義觀，寫作馬華革命文學。

（一）族群他者與女性革命身體：《督央央和他的部落》

馬共黨員重新出版的金枝芒小說是2004年的《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當中收錄三部他於部隊中創作和出版的中短篇小說《督央央和他的部落》（1954）、《烽火中的牙拉頂》（1958）和《甘榜勿隆》（1958），分別書寫了原住民（orang asal，馬共稱為「阿沙」）、華人

9 馬共於1961年接受中共財政援助，重啓武裝鬥爭，一改1959年「偃旗息鼓」的政策。總書記陳平等領導層亦前往北京，就此長期居住在中國（陳平2004: 386-392）。

10 這包括《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金枝芒2004）、《飢餓》（金枝芒2008）、《烽火中的牙拉頂》（金枝芒2011）、金枝芒編寫的《十年：抗英戰鬥故事輯（一）至（五）》（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2013）以及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2018）編輯出版的《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

11 近20年來關於新馬左翼歷史的文獻、回憶錄、歷史著作、文學作品、紀錄片等層出不窮，這些書寫都嘗試突破長久以來的噤聲和禁忌，形成了記憶文化現象（蘇穎欣2020）。

和馬來群眾對革命的支持。無可否認，金枝芒筆下的異族皆以他者姿態呈現，馬共作者主導的敘事聲音強烈。但他深入描繪他族的部落生態、生活習慣、用語，更試圖揣摩和捕捉人物情感思想，體現他力求貼近在地語境的寫作方式。這也說明作為馬共文宣的他，意圖將馬共革命刻畫為馬來亞全民的革命，不僅限於華人而已。這幾部小說以馬共如何深入群眾生活得民心為主題，富有激起群眾革命意識的「教化」意義。當中，馬共黨員總是形象良好、進步理性的革命者，而原住民和馬來村落的「落後性」被突出，等待馬共英勇協力對抗外敵（英殖民軍警、土匪和奸細），最後成功解救受困的民眾。

《督央央和他的部落》在1954年油印出版，講述霹靂州深山裡的阿沙部落，因英政府對馬共的圍剿行動而被迫強行撤離森林，住進集中營。在阿沙人眼中，馬共是幫助部落的好人，「紅毛兵」則是惡毒的魔鬼。小說分為五章：森林、奸細、煙袋、啄木鳥、巴冷刀。開頭描繪阿沙部落與森林為伍的自由生活，領袖督央央如何受部落民眾愛戴。不久，部落出了「奸細」依淡，認為森林生活落後，當上英國人特警，最後逼迫整個部落搬到集中營去。為情人編織煙袋準備出嫁的康妮，在集中營親眼見到愛人被紅毛兵的槍打死，爾後更多次遭強暴。最後部落在馬共的解救下，康妮刺殺了紅毛警長，部落成功逃出集中營，重新進入森林過活。

小說明顯帶著馬共視他族為落後民族、試圖教化他族的視角。例如開頭就形容阿沙「長期吃木薯，身體不健康；沒有醫藥，沒有衣服〔…〕奇怪的迷信和骯髒的習慣」（金枝芒2004: 17）。另一部小說〈甘榜勿隆〉對馬來鄉村的形容則更為直接：

整個甘榜勿隆，除了鬼鬼怪怪的巫醫之外，沒有醫生，也沒有醫藥，加上迷信和骯髒的習慣，毫不講究衛生，棚下和周圍就是屎糞和各種各樣的果皮，果殼在腐爛而不加打掃，因而充滿了蚊蟲、蒼蠅和「兀仔」，爛腳、瘡疾、痢疾、貧血等等的病症，成為普遍的現象。（ibid.: 187-188）

在如此背景的鋪陳下，馬共有紀律、有禮、機靈的好形象成為「解放」他族的英雄，也提供他們有別於英殖民現代性的思想（社會主義）和醫療

（馬共經常為村民看病）。督央央的部落經常有馬共黨員老江和加入馬共的阿沙黨員巴谷出沒。督央央開始懷疑奸細依淡時，總是猶豫不決是否該逐出成長於自己部落的人；老江看在眼裡，卻沒有直接教導督央央該怎麼做，而是希望他通過實際經驗來覺悟。他心想，阿沙的覺悟和認識都在提高，但因為他們「缺乏文化」，要了解道理需要依靠自身經驗，尤其必須通過他們親身接觸的「活生生的事實」才行。因此，老江壓抑下要求督央央消滅依淡的想法。這是典型的革命小說場景，革命戰士需要使用民衆了解的語言，以讓他們能自我覺悟。最終，督央央因為沒有及早聽從馬共勸告撤離，而導致依淡帶領警隊來到森林，將部落人們逮捕逼遷至集中營。小說中，督央央的軟弱和優柔寡斷襯托出「朗外」（阿沙對馬共的稱呼，意為好人）的理智勇敢。敘述者進一步形象化地描寫督央央的內心焦慮與懊悔：

難堪的懊惱折磨著他，一時神經都麻木了。一會兒，他又瘋也似的盡用拳頭擊打著自己的胸膛，心裡有千萬個「該死」的聲音，可是舌頭僵硬了似的，連一聲都吐不出。隨即他又甩動那靠在棚柱上的花白的頭，連連的向後砸擊著。好像要把心裡所有那「該死」的聲音，都從這連接的碰擊中發洩出來；然而，竹筒不斷地發出「通通」的聲響了，他心裡那惱人的聲音卻還原封不動啊！（ibid.: 41）

督央央因為懊悔，進了集中營後不久就病倒了。小說塑造的這個善良可敬的原住民領袖形象，卻在面對殖民統治壓迫時手足無措，而需馬共戰士引導和解救。另一方面，金枝芒筆下的馬共戰士卻是過於單面的「好人」形象。小說中經常描寫督央央等人在心中想著馬共來營救的畫面，但馬共卻是沒有臉譜、沒有任何情緒的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反之，督央央和部落民衆卻是會快樂、憂心、氣憤、活生生的人。例如，包栗豐收和部落青年新婚時，他們舉辦歡樂的弄迎舞會（ronggeng）。小說巨細靡遺地描述因為丈夫巴孟受依淡蠱惑當特警而感到羞恥的康孟孟；因愧疚自己無法帶給部落安定生活的督央央，總是在心裡盤算些什麼；還有待嫁的康妮滿心甜蜜地編織花紋精巧的煙袋，在愛人被殺死後不發一語，忍受蹂躪，滿心等待報復的時機。

致力於書寫革命文學的金枝芒，雖然帶著馬共主導的敘述視角，要求角色發出符合革命敘事的理性聲音，但這些角色的發聲卻呈現受壓迫群眾的非理性面貌，而這才是活生生的革命主體。小說的高潮場景，是不顧一切奔向紅毛警長的康妮，拔出巴冷刀刺向他胸膛的瞬間：

最大的仇人在面前了，康妮心頭的一團仇恨的烈火一下子就爆發開來了。她看到她的仇人爬了幾步，又突然站起來彎著身子逃跑的時候，康妮已經不能察覺她身邊有一個巴谷在開著槍追擊，她只害怕這隻野獸的頭目會從她面前逃脫。她已經記不得老江的吩咐，也忘記了身邊的巴谷。她一下拔出了腰間的巴冷刀，飛奔著追趕去了。許多日子來，那心頭堆積起來的仇恨，此刻都化著了奇異的力量，使她真是像一支箭一樣的飛奔著，一下就越到巴谷的前面去了。巴谷叫她不要追，叫她伏下來，叫她讓開路，她都聽不到。她還是那樣飛奔著，飛奔著。（ibid.: 72）

忘我的康妮衝向紅毛鬼，卻遭對方連開兩槍中彈倒地。她再度奮力起身奔到紅毛鬼身邊，舉起手中的巴冷刀，「狠心狠命地向那朝天仰著的胸膛插下去」（ibid.: 73）。紅毛鬼死了，康妮也在部落人的眼淚中嚥下最後一口氣。小說設定原住民女性殺死英國警長的結局，在馬華文學中應是創舉。康妮從一個開朗樂觀的女孩，因受到欺辱而轉變為心懷恨意的復仇者；而她最後發狂似的進擊，不僅僅是對殖民壓迫的反擊，亦可視為對革命紀律和男性敘事的反抗。她見著仇人就無法按兵不動，不聽從馬共的指示而飛奔出去，最後犧牲自己的性命，卻也為愛人巴查因報了仇。小說中，真正有革命自覺的人是康妮，而非其他男性角色。不過，這樣的醒覺卻是以命抵命；康妮的死讓勝利的氣氛變得意義不明。小說的最後，馬共隊伍護送督央央和他的部落回到深山，老江說：「朗外和阿沙一起在森林里，就好像魚在水裡了」（ibid.: 75），暗示馬共成功取得原住民信任，一同走向革命道路。康妮犧牲自己的形象，也成為馬共鼓勵部落人民勇敢抗敵的楷模。然而，敘述者倉促在結局鋪展的樂觀情緒，卻無法直接置換部落人民抬著康妮屍體走回森林的悲痛。「一路上誰也沒有歡呼笑樂〔…〕康妮一路跑一路哭，要康孟孟一直扶著她才不致跌倒；巴古默默無言的帶著路〔…〕常常要抹去飽含的熱淚才看得見走路。」（ibid.: 74）

反差的張力在抵抗著革命敘事的理性。換言之，金枝芒固然帶著馬共

革命話語試圖主導小說的敘事走向，更安排了必然的樂觀結局（政治正確的封閉敘事），但其細緻勾勒原住民部落面對的此時此地現實，也深入刻畫督央央和康妮等人的矛盾心理，反而讓這些不受束縛的聲音穿透封閉敘事本身，使人留下深刻印象。原住民女性手中染血的巴冷刀，雖然為馬共革命助了一臂之力，卻也同時是令人警醒的反抗——抗拒華人（男性）主導的革命敘事對原住民（女性）身體的控制。犧牲的康妮的身體卻是革命文學主流敘事中不被看見的那個。另一方面，力求以書寫深入現實的金枝芒，在這部小說中突出康妮的悲劇角色，其實也暗示了革命的悲劇性以及馬華文學主體建構的難題——族群他者在國族敘事中只能是犧牲的身體。

（二）殘酷的美與現實的血肉：《飢餓》

金枝芒作品重新出版後，最引起討論的自然是在出版於1960年的長篇小說《飢餓》（金枝芒 2008）。雖然金枝芒主導馬共的宣傳機器，這本小說的文學筆觸卻超越了為黨宣傳的基調，呈現馬共文學豐富的「文學性」面向。《飢餓》描述同屬一小隊的15位馬共戰士，在英殖民的「餓斃政策」¹²下面臨斷糧危機，卻仍堅持鬥爭的慘烈故事。小說生動地描繪各個戰士迥異的個性和豐富的戰鬥經驗；然而，戰士們陸續犧牲，小隊與組織失聯而成「孤軍」，最後只有5位成功突圍。金枝芒形象地描寫他們受困飢餓的死亡過程與狀態，呈現森林游擊隊的窘況及求生意志。相較於《督央央和他的部落》中刻畫原住民的悲劇遭遇，《飢餓》則將悲劇主角換成了馬共本身。然而，馬共黨高層對金枝芒如此毫無隱瞞、慘不忍睹的「真實」寫法提出異議，認為對游擊隊員的戰鬥士氣構成打擊（莊華興2018: 29）。據稱，《飢餓》後來不再在隊中傳閱，馬共戰士們也無法讀到。¹³可見，金枝芒深入現實的悲劇性描寫，反而被認為對革命造成阻力，是現實的反芻。或者可以說，那是馬共革命敘事的自我分裂。

12 1950年，為了切斷民眾對共產黨的補給，英國殖民者啟動「畢禮斯計劃」（Brigg's Plan），在全馬各地建造「新村」，將約50萬人（絕大多數為華人）大規模移居至此。新村範圍全面圍籬，戒備森嚴，民眾的行動和糧食都受軍警監視，被稱為「集中營」。

13 根據筆者對一名1970年代參加鬥爭的前馬共黨員的採訪，當時在軍中能讀到《十年》、《烽火牙拉頂》等作品，卻不能讀到《飢餓》。

《飢餓》雖是革命小說，但吊詭的是，這40萬字的長篇小說中，游擊隊和敵人駁火衝突的篇幅少之又少。小說中游擊隊面對的最大敵人其實是飢餓，他們在局限的森林空間不斷出發尋找糧食、尋找突圍的空隙，卻一再受困。

飢餓，越來越兇惡的蹂躪著隊伍，同志們已經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了，本來年輕力壯的，不見了泛著紅潤顏色的豐滿的肌肉，變得面黃肌瘦，衰弱起來了；桂香的病日漸沉重，吃野菜喝水要人扶著坐起來；青蓮腳腫面腫，傷腳近乎殘廢，扶著木棍走路也覺吃力；年輕的小良，從小嬌生慣養，未經體力鍛煉，不曾吃過苦，身體激劇衰弱……（金枝芒2008: 114）

隊員們處於生死險境和餓斃邊緣，每出任務必定損兵折將——吃毒菜昏死、爬樹摔倒、被棕櫚刺扎破皮肉、被河水沖走……以至於每一個出發找糧食的任務，都必須仔細盤算。找到糧食生存下來，成為這支游擊隊最主要的任務，而非行軍殺敵。例如小說花了30頁的篇幅，巨細靡遺地描寫隊伍如何計劃砍「檸檬」的過程。¹⁴惟隊伍都是老弱殘兵，早就餓得沒力氣，砍棵樹都是大問題；但不砍卻將完全斷糧，只有賣命地砍，過程中卻又經常遭遇不測。小說不斷在這種富有儀式性的循環中進行，而隊員只能完全依靠意志來支撐他們既悲涼又激越的行動。鄧觀傑（2019: 199）敏銳地注意到，金枝芒筆下的游擊隊員覓糧不是為了讓身體存活，而是為了延續革命。金枝芒大量勾勒肉身的磨難和殉難，是意圖將這些身體「轉化成推動革命的燃料，以革命取代肉體本能」（*ibid.*）。他認為，聚焦在飢餓慘狀的革命書寫旨在引起讀者對革命的認同，「死亡帶來的震撼越大，越能激起讀者對革命的同情」（*ibid.*: 202）。或也因為如此，小說中森林的匱乏程度也被誇大，例如在茂密的熱帶雨林中幾乎沒有動物出沒。相較而言，《十年》匯集的戰士故事中，就有不少寫到吃大象肉、猴子、山豬、狗熊、鹿等的經驗，也有碰到老虎的故事。金枝芒刻意讓除了人以外的生物缺席於這場革命，集中在人和自己飢餓的身體抗爭的情節。人的身體頓時變成完成革命的所有內容，卻也在在顯示這樣的身體有多脆弱和渺小。小

14 所謂檸檬其實是一種土生的野棕櫚，馬來人稱為nibong，必須把整棵樹砍倒才能取其心食用。

說中，女性異常刻苦堅毅，負責照顧部隊起居飲食的工作，也比男同志更能耐得住飢餓和傷痛；男性領導老劉優柔寡斷，其他衝動的年輕男隊員則經常禁不住飢餓誘惑而吃下毒菜昏倒。唯一展現英勇男戰士形象的陳月，最後卻是親手殺死自己剛出生嬰孩的父親，這何嘗不是對革命「絕後」的預示。

金枝芒對死亡臉譜具體細緻的描寫，是小說最大的張力所在。他突出戰士瀕死的表情、思想、感受，迫使讀者共同目睹觸目驚心的死亡過程。然而，這些死亡面孔真的能夠激起讀者對革命的同情嗎？抑或，那對個人生命的同情，反而更突顯革命目標的幻滅？金枝芒深入描寫這些可怖的死亡場景，未嘗不是在叩問革命的前景和意義。例如，採檸檬從高處摔下的老方，手腳摔斷，「腸肚、肺臟跌個稀爛，七孔都汨汨地流出鮮血來」（金枝芒2008: 127）。

（老方）昏沉朦朧中，只覺全身內內外外都劇痛，想睜開眼來看究竟跌得怎樣。可是，兩顆眼珠已經突了出來，像兩個血球一樣垂落在眼眶邊。前面是無窮無盡的黑暗；筋絡吊掛著的眼珠，像是用魚釣鈎掛著的兩塊巨石。實在痛得難耐，想把它們塞進眼眶去或索性摘掉，可是連那隻還未跌斷的手臂也抬不起來〔…〕阿冬跪著，躊躇地舉起雙手，索索地抖動著，托起那兩顆突出在外面的血淋淋的眼珠，輕輕塞回眼眶去。一下，像有千百支針一齊在眼窩鑽刺一般，老方啣呀一聲，嚇得阿冬縮開了手，眼珠又跟著汨汨地流著的鮮血滑了出來，照舊垂落在眼眶下邊。（ibid.: 127-128）

老方沒有跌死，卻身處「更大的災難」和痛苦。最後，雖然耳邊響起革命戰士不得自殺的聲音，他還是扣上扳機，舉來福槍自殺了。另一個同樣令人駭目的描寫，是「餓鹽」的故事。部隊已數個月沒吃到一粒鹽，都靠野菜配糖精水為生；一個同志忽然想起曾藏了三罐鹽在樹頭下，隊長便派了三人去找。其中一個隊員小良，是知識分子出身，身體孱弱，已經餓得不像話。挖到鹽罐後，三人準備就地過夜一晚再回到營地和隊友分享，不過小良心裡卻冒出他自己也不敢面對的慾望來。小說描寫小良不斷在自私慾望和良心譴責之間左右難安，飢餓的痛苦卻使他無意識地打開了鹽罐，一粒一粒地偷吃起來。當他的慾望猛烈得一發不可收拾時，鹽已經「成

了毒藥一般的致命的東西了」（*ibid.*: 178）。他陷入虛幻狀態，思緒已和身體分離。隔天一早，另外兩位同志驚訝地望著身旁吃鹽致死的夥伴。

小良嘴巴開開，像個深不可測的洞穴。牙齒和嘴唇之間，甚至兩個鼻孔都塞滿了鹽；下巴、額頭、吊床上都散落著鹽粒；一隻垂落在胸前的手還握著半把鹽。兩隻眼睛還張得大大的，卻盡是白茫茫的顏色。床邊，鹽罐還打開著。（*ibid.*: 178）

老方和小良在死前，無不對作為共產黨人的自己腦中的念頭和慾望有所批判，最終皆以行動終結了意識和生命（有尊嚴地死去？）。小說中，除了隊長老劉的死可說是「壯烈犧牲」——他和敵人駁火陷入絕境後，高喊「共產黨萬歲」後墜入深谷自殺——外，其他隊員都因飢餓、病痛、中毒、意外而慘死。這些有關死亡劇痛的震撼描寫，讓作為目擊者的讀者為之驚悚且不忍直視，極致地展現文學「崇高」的悲劇性力量。論者對小說刻畫飢餓的文學性予以肯定，認為那是帶著「（殘酷的）審美趣味」，以文學自身為目的，具有強烈的「現代感」（黃錦樹2015c: 326）。原因是死亡不屬於任何人，而是「人的普遍存在的一部分」（*ibid.*: 325-326）。然而，是否唯有將《飢餓》放置到現代主義美學的範疇之中，其文學性的意義才得以成立？如此一來，作為革命文學的《飢餓》，其實質意義也被化約（升華？）為「為文學而文學的文學」了。死亡雖是普遍的，但小說中的死亡臉譜和慘狀並不普遍（有多少人曾因餓鹽導致吃鹽過量而死？），那是從軍旅生活的實際經驗萃取出的「現實」。

從時間性的角度來說，由於革命小說的「未來取向」——支撐游擊隊的意志往往是堅信自己正通往光明的未來——經常以未來為價值和目的，以致蔑視過往，抹殺現在（黃子平1996: 28）。就此而言，《飢餓》自然不無這種未來取向，游擊隊員完全依靠「革命終將勝利」的意志支撐過常日的飢餓。然而，由於金枝芒深入現實的極致描寫，這些戰士們飢餓和死亡的臉譜正是補充了「此時此地」現實的血肉，讓戰士生活的當下和現在活生生地被看見、感受和體驗，不輕易被抹殺，甚至對未來有著不能言說的恐懼。這「此時此地」的描寫，無非是作者金枝芒的親身實踐和真正經驗換來的。

相較於創作於1954年的《督央央的部落》，出版於1960年的《飢餓》對革命悲劇的描寫更為明顯，甚至展現出對革命未來的死亡恐懼。金枝芒出版《飢餓》後不久，就被組織調到中國去了。馬來亞於1957年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後，馬共的鬥爭也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領導人和黨員相繼投誠，政府也漸漸殲滅了各地游擊隊。到了1958年底，馬共中堅隊員人數總和只有350人，以致1959年馬共決定放棄武裝鬥爭（陳平2004: 364, 389）。換言之，《飢餓》其實創作於部隊士氣最低落的時期，甚至有預言革命將失敗的傾向。這樣的革命文學，既沒有高大英勇的戰士形象，而是一個個遭飢餓摧殘的身體和可怖的死亡臉譜，也沒有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正面期待，反而呈現出對飢餓未來的懼怕。金枝芒深入革命現實的文學寫作，恰恰打開了革命敘事——黨勝利的必然樂觀結局——原來的封閉空間，呈現了革命身體對實踐命運的預言和恐懼。這樣的執拗或許是現實主義寫作最誇張的實踐。或許就如魯迅（1927）所言：「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我們聽見金枝芒筆下的角色，正在如此吶喊著。

相較於大量出版的馬共領導層和黨員的回憶錄和口述歷史，馬共文學除了作為革命的證言，更是文藝實踐論的具體「實踐者」。金枝芒在1947-1948年論戰提出的文藝理論，通過《飢餓》的寫作展現其具體實踐的可能和困難。換句話說，《飢餓》的出土意義不應只是「文學與革命緊密連接的見證」（黃錦樹2015c: 331），它更是文學作為革命的實踐寫作。誠然，作為革命的文學自然是政治的，甚至以政治為目的，並非「為文學而文學的文學」，但《飢餓》卻呈現抵抗馬共主流革命敘事的反差張力，長出了文學悲劇性力量的枝椏。要說它在中世紀以後的出土，是對「此時此地論」的一大反諷（即它的在場和出土已是革命終結後多年），¹⁵或許我們更可以確認金枝芒的現實主義並不局限在反映客觀當下的此時此地，而是預示著此小說足以跨越時間限制的未來性，並且超越它作為革命小說的當下政治功能，在後革命時代被跨世代閱讀。作為革命的文學經歷時間的洗

15 審查人A的意見。

禮，在半世紀以後和讀者相遇，它的現身並不只是革命曾經發生的證言，反而觸發人們對當下的後革命時代更多的自覺和反省。這包括了後殖民文學研究多年來過於強調來自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作品，而忽略總被視為過時的現實主義文學（Cleary 2012: 265），或是近年華語語系文學研究亦聚焦在旅臺馬華現代主義作家，這些約定俗成的文學／美學喜好是否有重新評估的可能？面對金枝芒現實主義作品的出土，不禁讓人思考它刻畫的現實，是否足以打亂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和感受。甚至，它展示了我們從不覺得自己了解的現實，或是從未見過的現實，也讓過去無法被傳達的現實得以有言說的可能（Bowlby 2007: xviii）。

對金枝芒而言，現實主義不僅是文學話語、文藝理論或是寫作方法，而是直面現實的態度（共產黨人的革命任務），但他在書寫的過程中卻不斷對現實進行勘驗和思索，方才出現革命內部的自覺反省。馬華革命文學向我們展示的，是文學與身體實踐的具體結合，是文學對當下現實的認知和干預，也是文學對未來的預示甚至是介入。就此而言，現實主義不僅是書寫此時此地，也意味著在此時此地思考。因此，《飢餓》一方面忠於作為革命的文學寫作，秉持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一方面卻又試圖超越革命敘事本身的功能。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飢餓》讓人讀出「現代感」，拉近了向來被視為對立的兩個文學意識形態陣營的距離。就如韓國文學批評家崔元植（2020: 298）所說：「現實主義的最佳作品會在超越通常意義的現實主義那一瞬創作出來，現代主義的最佳作品亦會在超越通常意義上的現代主義那一剎那產生。」

四、小結

在《十年》編後語中，金枝芒強調戰士們應該「寫好事不寫壞事」；若戰士們欲寫的故事包括同志被攻擊或打敗仗，但表現出同志的勇敢，又有教育意義的話，「只要重點放得準，也就成了好事了」（金枝芒2013: 250-252）。本欲「寫好事」的《飢餓》，其悲劇性卻成了這部作品最「好」的

部分了；馬華革命文學也成為馬華文學中最有「獨特性」的類別。馬共革命的失敗，導致革命文學失去了它的「此時此地」鬥爭功能，但革命文學卻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也足以讓我們省思在馬來亞建構「民族」、展開革命之困難。金枝芒執著於現實主義寫作，現實主義的語言原來是相對「透明」及工具化的，但他卻用其來描寫極致的革命經驗，將語言的特性發揮到極點。文學的語言和革命的身體，在這裡成為矛盾的綜合體，似乎也隱喻著，馬華文學和文化的存在，不得不是一個「不斷革命」的主體。

雖然在文藝實踐理念上參照了中國革命的論述和經驗，但金枝芒以「雙民族」視角嘗試建構馬華（民族）文學的主體性，卻在馬共革命以失敗告終後，留在他的革命文學寫作裡。那些困難重重的長征、自我犧牲的悲劇，在革命失敗後似乎顯得意義不明，但卻是革命者以身體交換而來的「主體」追求與實踐。或許可以說，金枝芒在軍中寫作這些革命身體，正是延續了他在獨特性論戰中的立論——站在「幼稚」的馬華文學這一邊，思考此時此地，書寫此時此地。而這些此時此地書寫不僅僅反映客觀現實，也干預了現在、叩問了未來。在離開馬來亞轉移到中國以前，金枝芒留下了這部作品，頗有為馬來亞共產革命和自己的馬華文學創作總結之意味。金枝芒離馬後是否仍有創作，從目前戰友為其出版的作品來看，應是寥寥無幾；惟或許可從他為革命之聲電臺寫的廣播稿，探究一些蛛絲馬跡。「離散」後的他，是否無法再創作了？或無法創作出「偉大作品」了？也許，對強調涉入現實、挖掘此時此地的金枝芒而言，「流寓」心態一直是他所棄絕的。由於歷史之吊詭，他的後半生竟是在「僑民」身分下度過的，也在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的前一年（1988年）離開了人世——頗有意味地封存在革命的年代中。

就此而言，金枝芒不只是創作文學的小說家，亦是編輯、翻譯和參與革命的游擊隊員。就算將之奉為高高在上的文學家，也不該忽視其作品中呈現的集體創作形態和否定作者專利的匿名性。今天重訪獨特性文藝論戰和重讀金枝芒作品，乃希望能回到歷史深處去挖掘其個人、論述和作品的生產機制，從中把握多年來因各種審美批評話語的流行和衍變，而被遺忘

的歷史／文學的多元和意義。今天再問「此時此地的現實」到底是什麼，未嘗不是反省歷史交給我們面對現在和未來的功課——「革命」不再可能了嗎？爲什麼？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Editors of 21st Century Publisher）主編。2013。《十年——抗英戰鬥故事輯（一至五輯）》*Shinian: kangying zhandou gushiji yizhiwuji* [Ten Years: Anthology of Anti-British Battle Stories, Vol 1-5]。吉隆坡（Kuala Lumpur）：21世紀出版社（21st century Publisher）。
- 。2018。《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Mianhuai maxin wentan qianbei jin zhimang* [Remembering A Senior Literary Fig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in Zhimang]。吉隆坡（Kuala Lumpur）：21世紀出版社（21st century Publisher）。
- 方山（Fang, Shan）。2004。〈後記〉“Hou Ji” [Postscript]，收錄於《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Renmin wenxuejia Jin Zhimang kangying zhanzheng xiaoshuoxuan* [A Collection of Anti-British Stories by People's laureate Jin Zhimang]，方山（Fang, Shan）主編，頁301-302。吉隆坡（Kuala Lumpur）：21世紀出版社（21st century Publisher）。
- 方修（Fang, Xiu）。1965。《馬華新文學史稿（下卷）》*Mahua xinwenxue shigao (xiajuan)* [History of New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Vol.2)]。新加坡（Singapore）：世界書局（World Books）。
- 。1970。《馬華新文學大系·第四冊〈小說二集〉》*Mahua xinwenxue daxi di si ce (xiaoshuo erji)* [Anthology of New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Vol.4 (Stories II)]。新加坡（Singapore）：世界書局（World Books）。
- 。1987。《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Zhanhou mahua wenxueshi chugao* [Draft on Post-war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吉隆坡（Kuala Lumpur）：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 朱齊英（Zhu, Qiying）主編。2009。《馬來亞民族運動史料選輯（上、下冊）》*Malaiya minzu yundong shiliao xuanji (shang xia ce)* [Anth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alayan Nationalist Movement]。吉隆坡（Kuala Lumpur）：馬來亞勞工黨黨史工委會（Party History Working Committee

of Labour Party of Malaya)。

吳小保 (Goh, Siew Poh)。2016。〈國語運動的多重性：馬、新華巫語文菁英的語言理念分析〉“Guoyu yundong de duochongxing: maxin huawu yuwen jingying de yuyan linian fenxi” [Multiplicity of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Malay Elites Ideologies]，〈臺灣東南亞學刊〉 *Taiwan dongnanya xue kan*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1(2)，頁107-140。

——。2019/12/06。〈讀《紅潮》，看那些年的文革潮文學〉“Du hongchao, kan naxie nian de wengechao wenxue” [Reading *Red Wave*: Cultural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Those Days]，〈南洋商報·商余副刊〉 *Nanyang Shanbao Shanyu Fukan* [*Nanyang Siang Pau, Shang yu literary supplement*]。

沙平 (Sha, Ping)。1948。〈朋友，你鑽進牛角尖裡去了！〉“Pengyou, ni zuanjin niujiaoian li qule” [Friend, You Got into The Dead End]，〈風下〉 *Fengxia* [*Beneath the Wind*]，第108期，頁1-3。新加坡 (Singapore)：新南洋出版社 (New Nanyang Publisher)。

金枝芒 (Jin, Zhimang)。2013 (1958)。〈編後〉“Bian hou” [Editor’s Note]，收錄於《十年 (第四集至第六集)——抗英戰鬥故事輯 (二)》 *Shinian (disiji zhi diliuji): kangying zhandou gushiji II* [*Ten Years (Vol 4-6): Anthology of Anti-British Battle Stories II*]，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 (21st century publisher editors) 主編，頁250-252。吉隆坡 (Kuala Lumpur)：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2004。《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 *Renmin wenxuejia Jin Zhimang kangying zhanzheng xiaoshuoxuan* [*A Collection of Anti-British Stories by People’s laureate Jin Zhimang*]。吉隆坡 (Kuala Lumpur)：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2008。《飢餓》 *Ji’e* [*Hunger*]。吉隆坡 (Kuala Lumpur)：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2011。《烽火中的牙拉頂——抗英戰爭長篇小說》 *Fenghuo zhong de Yala Ding—Kangying zhanzheng changpian xiaoshuo* [*Ulu Galas in Flames: An Anti-British Novel*]。吉隆坡 (Kuala Lumpur)：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周容 (Zhou, Rong)。2018 (1947/12/26)。〈談馬華文藝〉“Tan mahua wenyi” [On Chinese Malayan Literature]，收錄於《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 *Mianhuai maxin wentan qianbei jin zhimang* [*Remembering A Senior Literary Fig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in Zhimang*]，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 (21st century publisher editors) 主編，頁198-204。吉隆坡 (Kuala Lumpur)。

- Lumpur) : 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
- 。2018 (1948/1/17-24) 。〈也論「僑民文藝」〉“Yelun ‘qiaomin wenyi’” [Also on ‘compatriot literature’], 收錄於《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Mianhuai maxin wentan qianbei jin zhimang* [Remembering A Senior Literary Fig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in Zhimang], 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 (21st century publisher editors) 主編, 頁214-231。吉隆坡 (Kuala Lumpur) : 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
- 阿都拉曼恩蓬 (Abdul Rahman Embong) 。2017。〈重返馬來亞：構想民族 (國家), 思想的歷史與歷史的思想〉“Chongfan malaiya: gouxiang minzu (guojia), sixiang de lishi yu lishi de sixiang” [Revisiting Malaya: Envisioning the Nation: History of Ideas and Ideas of History], 收錄於《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Chongfan malaiya: zhengzhi yu lishi sixiang* [Revisiting Malaya: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Thoughts], 魏月萍、蘇穎欣 (Ngoi Guat Peng and Show Ying Xin) 合編, 頁3-24。吉隆坡 (Kuala Lumpur) : 亞際書院與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Inter-Asia School and SIRD) 。
- 林萬菁 (Lim, Buan Chay) 。1994。《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 (修訂版)》*Zhongguo zuojia zai Xinjiapo ji qi yingxiang 1927-1948 (xiuding ban)*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s of Chinese Writers in Singapore 1927-1948 (Revised version)]。新加坡 (Singapore) : 萬里書局 (Wan Li Book Co.) 。
- 秋楓 (Qiu, Feng) 整理。2018 (1947) 。〈「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座談會〉“‘Mahua wenyi de dutexing’ zuotan hui” [Forum on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Malayan Literature]。收錄於《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Mianhuai maxin wentan qianbei jin zhimang* [Remembering A Senior Literary Fig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in Zhimang], 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 (21st century publisher editors) 主編, 頁187-197。吉隆坡 (Kuala Lumpur) : 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
- 陳平 (Chin, Peng) 。2004。《我方的歷史》*Wofang de lishi* [My Side of History]。新加坡 (Singapore) : Media Masters 。
- 崔元植 (Choi, Won Sik), 王艷麗 (Wang, Yanli) 翻譯。2020。〈「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會通〉“xianshi zhuyi yu xiandai zhuyi zhi huitong” [Conjoining “Realism” and “Modernism”], 收錄於氏著《這裡是羅德斯：東亞國際主義的理想與現實》*Zheli shi luodesi: dongya guoji zhuyi de lixiang yu xianshi* [Hic Rhodus: The Ideals and Reality of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ism], 頁283-300。臺北 (Taipei) :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Taiwan Social Studies Journal Publisher) 。
- 崔貴強 (Choi, Kwai Keong) 。2007。《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1959 (修訂卷)》*Xinma huaren guojia rentong de zhuanxiang 1945-1959 (xiuding ban)*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45-1959 (Revised Version)*]. 新加坡 (Singapore) : 青年書局 (Youth Books) 。

莊華興 (Chong, Fah Hing)。2005。〈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主體 (性) 論述的開展及其本質〉“Mahua wenyi dutexing lunzhan: zhuti (xing) lunshu de kaizhan ji qi benzhi” [Debate on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Malayan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ity Discourse and Its Essence]，收錄於《世界華文文學研究 (第二輯)》*Shijie huawen wenxue yanjiu dierji*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Vol.2]，朱文斌 (Zhu Wen Bing) 主編，頁15-32。北京 (Beijing) :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2013 (2008)。〈飢餓的歷史巨獸：從金枝芒的長篇抗英戰地小說說起 (初稿)〉“Ji e de lishi jushou: cong jin zhimang de changpian kangying zhandi xiaoshuo shuoqi (chugao)” [A Hungry Monster of History: On Jin Zhimang's Anti-British Battle Stories]，收錄於《十年 (第十三集至第十四集) ——抗英戰鬥故事輯 (五)》*Shinian (di shisanji zhi di shisiji): kangying zhandou gushiji V* [Ten Years (Vol 13-14): Anthology of Anti-British Battle Stories V]，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 (21st century publisher editors) 主編，頁247-261。吉隆坡 (Kuala Lumpur) : 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

——。2010。〈雙殖民主義下的馬華 (民族) 文學〉“Shuang zhimin zhuyi xia de mahua (minzu) wenxue” [Chinese Malaysian (National) Literature under Dual Colonialism]，收錄於《移民、國家與族群》*Yimin, guojia yu zuqun* [Migration, Nation and Ethnic]，龔顯宗、王儀君、楊雅惠 (Gung, Chian-Tzeng, Wang I-Chun and Yang Ya-Hui) 主編，頁171-191。高雄 (Kaohsiung) : 中山大學人社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2018。〈從失蹤到隱匿：以郁達夫和金枝芒為例探討馬華文學的存在之議〉“Cong shizong dao yini: yi yu dafu he jin zhimang weili tantao mahua wenxue de cunzai zhiyi” [From Disappearance to Concealment: On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A Case Comparison of Yu Dafu and Jin Zhimang]。收錄於《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Mianhuai maxin wentan qianbei jin zhimang* [Remembering A Senior Literary Fig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in Zhimang]，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 (21st century publisher editors) 主編，頁17-36。吉隆坡 (Kuala Lumpur) : 21世紀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er) 。

黃子平 (Huang, Ziping)。1996。《革命·歷史·小說》*Geming, lishi, xiaoshuo* [Revolution, History, Stories]。香港 (Hong Kong) :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黃孟文 (Wong, Meng Voon)、徐迺翔 (Xu, Nai Xiang)。2002。《新加坡華文

文學史初稿》*Xinjiapo huawen wenxueshi chugao* [Draft on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新加坡 (Singapore)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八方文化 (N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Global Publishing) 。

黃錦樹 (Ng, Kim Chew) 。2015。〈最後的戰役——論金枝芒的《飢餓》〉
“Zuihou de zhanyi: lun jin zhimang de ji e” [The Last Battle: On Jin Zhimang’s *Hunger*]，收錄於氏著《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Huawen xiaowenxue de malaixiya gean* [Chinese Minor Literature: Malaysia as An Example]，頁315-333。臺北 (Taipei) : 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

——。2018。〈「此時此地的現實」？——重探「馬華文藝的獨特性」〉
“‘Cishi cidide xianshi’? –chongtan ‘mahua wenyi de dutexing’” [“The Reality of Here and Now”? –Revisiting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Malayan Literature”]，收錄於《華文文學》*Huawen Wenxue* [Sinophone Literature] 145，頁26-34。

楊松年 (Yang, Song Nian) 。2001。《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Zhanqian xinma wenxue bendi yishi de xingcheng yu fazha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onsciousness in Prewar Singaporean and Malayan Literature]。新加坡 (Singapore)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八方文化 (N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Global Publishing) 。

楊貴誼 (Yang, Quee Yee) 。2006。《楊貴誼回憶錄：膠童與詞典》*Yang guiyi huiyi lu: jiaotong yu cidian* [Memoir of Yang Quee Yee: Rubber-Tapping Boy and the Dictionary]。吉隆坡 (Kuala Lumpur) : 南大教育與語言基金會 (Nantah Education and Language Foundation) 。

魯迅 (Lu, Xun) 。1927。〈革命文學〉“Geming wenxu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收錄於《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Zhongwen makesi zhuyi wenku* [Chinese Marxism Database]。Retrieved from: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11/026.htm> on Nov 30, 2020.

鄧觀傑 (Teng, Kuan-kiat) 。2019。〈身體·國體·文體：馬共小說中的異常身體〉“Shenti, guoti, wenti: magong xiaoshuo zhong de yichang shenti” [Body, Nation and Form: The Abnormal Bodies in Malaysian Communist Fiction]，收錄於《異代新聲：馬華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Yidai xinsheng: Mahua wenxue yu wenhua yanjiu jigao* [Voices of Alterngeneration: Essays on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熊婷惠、張斯翔、葉福炎 (Hsiung, Tinghui, Teo Shi Siang and Yap Hock Yam) 編，頁195-215。高雄 (Kaohsiung) :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謝詩堅 (Cheah, See Kian) 。2009。《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Zhongguo geming wenxue yingxiang xia de mahua zuoyi wenxue,

1926-1976 [Malaysian Chinese left wing literature : its influence by China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1926-1976]。檳城 (Penang)：韓江學院 (Han Chiang College)。

魏月萍 (Ngoi, Guat Peng)。2019。〈此時此地：馬華與中國左翼革命文學話語競爭〉“Cishi cidì: mahua yu zhongguo zuoyi geming wenxue huayu jingzheng” [Here and Now: The Contention Over Mahua and Chinese Leftist Revolutionary Literary Discourse]，收錄於《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魏月萍》*Mahua wenxue piping daxi: wei yueping* [Anthology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ry Criticism: Ngoi Guat Peng]，鐘怡雯、陳大為 (Choong, Yee Voon and Chan, Tah Wei) 主編，頁1-24。桃園 (Taoyuan)：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Yuanze University)。

蘇穎欣 (Show, Ying Xin)。2020。〈噤啞之後：新馬左翼歷史的記憶政治與當代冷戰敘事〉“Jinya zhihou: Xinma zuoyi lishi de jiyi zhengzhi yu dangdai lengzhan xushi” [After the Silence: Politics of Memory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n Leftist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Cold War Narrative]，《臺灣東南亞學刊》*Taiwan dongnanya xue kan*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5 (2)，頁95-130。

二、外文書目

- Ariffin Omar. 1993. *Bangsa Melayu: Malay Concepts of Democracy and Community, 1945-1950*.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ogurova, Anna. 2019. *The Nanyang Revolution: 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1890-19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wlby, Rachel. 2007. “Foreword,” in *Adventures in Realism*, edited by Matthew Beaumont, pp. xi-xviii.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Cheah, Boon Keng. 1978. “Malayan Chinese and the Citizenship Issue, 1945-1948,” *Review of Indonesian and Malayan Affairs* 12(2): 95-122.
- . 1979. *The Masked Comrade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5-48*.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 Cleary, Joe. 2012. “Realism after Modernism and the Literary World-System,”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3(3): 255-268.
- Hara, Fujio. 2016.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as Recorded in the Comintern Files. Singapore,” in *ISEAS Working Paper 1*. Singapore: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 Tan, Liok Ee. 1988. "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Tensi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00-1955," in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52*. Clayton: Monash University.
- Shen, Shuang. 2016. "Where the 'Trans-Pacific' Meets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edited by 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 pp. 456-47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eo, Kim Wah. 1973. "The Anti-Federation Movement in Malaya, 1946-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1): 31-51.
- Yong, C.F. 1997.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 Wang, D.W. David. 2017.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Gungwu. 1964. "Postscript," in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n Literature, 1930-1963*, edited by T. Wignesan, pp. 246-255. London and Malaysia: A. Blond with Raybooks Publications.
- Roff, William R. 1967.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